

## 「『情』之概念系譜在晚清民初的 召喚及跨域接受」專題引言

周志煌<sup>\*</sup>

近現代中國有關「情」之概念討論，就思想文化內在理路的發展來說，從清代以降到民初，學術界對宋明理學所強化的「天理／人欲」之分及其所產生之流弊，有了不同的省察思考。其中關涉「理／情」之概念，包括「理存乎欲」、「以情絜情」、「達情遂欲」的提出，都試圖擺脫「天理」懸之於形上的道德規範意義，而著眼於形下生活世界當中「情」之倫理關係經營。這一倫理關係取向（relationship orientation），不僅在於強調人與人之各種情感連結所產生的倫理互動與安置，同時也包含了人與政治、社會（禮法、人倫秩序）；人與自然、宇宙（終極關懷、生命價值）等之重新認識與定位。五四以降的思想課題，與中國18世紀中葉以來反禮教、理學的思潮一脈相承。可以說，「情動」之於生活世界，不僅是私人個體的自我價值追尋，同時也常形之於我者／他者公共倫理的意義展現。尤其近代中國各種革命所動員的「熱情」，或是媒體輿論所召喚的「同情」，這些現代性「情」之概念系譜，在歷史世界的動能不僅變化萬端，且形成重層的網絡。

---

<sup>\*</sup> 作者現為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關於近現代思想研究，過去學人或以挑戰／回應、救亡／啟蒙等二元框架來處理，連帶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以降的「科學理性」及相關思維，也在此二元框架之中，成為學界研究之主流。然而近年來張灝接槩「五四思想的兩歧性」，指出五四精神和中國傳統、西方思想的複雜糾結關係。<sup>1</sup>彭小妍透過「唯情與理性的辯證」，展示了科玄論戰中「人生觀派」發動的唯情論及情感啟蒙論述。<sup>2</sup>若再加上王德威、陳國球、陳建華等學者，對於「抒情之現代性」及其相關論述與中國文學之鉤合，<sup>3</sup>相關專文不僅將20世紀初「抒情傳統」觀念在兩岸三地及海外，特別是北美等地的系譜關係加以接榫探討，而在處理晚清民初新、舊文學之爭外，也正視傳統學者或文人在保存國粹的前提下所形塑的某種現代性主體，同時展示了「抒情傳統」在調動、形塑民族的「情感結構」之潛力與極限。因此，在「情」的系譜召喚及跨域接受中，革命與浪漫、國粹與西化的結合，讓「南社」、「同光體」等詩派，或是左翼文人的舊體詩寫作，都在重寫近現代文學史或學術史的脈絡下，有了新的論述拓展之可能。

通過上述學者近年來所揭示的「情」之相關概念群組，在思想與文學領域的發酵作用來說，都讓我們看到科學／玄學；禮／情；理性／浪漫……從來都不是二分的概念，也許在民初知識界的文藝、思想、文化論戰中，不同個人或社群為了強化自身之論述，為了明確分判彼此信奉之某種價值信念，或是主義、意識形態之差距，相關概念言說往往會被激進化及對峙起來。然而，晚清民初的「唯情」及「情動」論述，既接受西方浪漫主義及現代性精神，同時也可以將柏格森

<sup>1</sup> 張灝：〈重訪五四：論五四思想的兩歧性〉，《張灝自選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252。

<sup>2</sup> 彭小妍：《唯情與理性的辯證：五四的反啟蒙》（臺北：聯經，2019年）。

<sup>3</sup> 可參見陳國球、王德威編：《抒情之現代性：「抒情傳統」論述與中國文學研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陳建華：《從革命到共和：清末至民國時期文學、電影與文化的轉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

(Henri Bergson, 1859-1941) 的「直覺」、「時間的連綿性」等議題納入。此外,「情」的召喚及其整體、連續性、流動的相關概念,也可與中國傳統思維中的「生生」、「萬物一體」、「情景交融」等進行對話。再者,經由近現代中國知識的轉型、生產與傳播,不僅讓各學科知識專業分類欲趨縝密,同時學科之間的連結對話,以及來自不同區域的翻譯知識,也援引進入近代中國的知識界。來自不同分科與地域的知識,都呈現出「跨域」過程中創造性轉化的詮解可能。晚清民初學者、文人對於「情」之概念闡發,其「跨域」不僅是地域的中西,也是文學、史學、哲學、心理學、人類學等學科知識的越界與對話。

本期「『情』之概念系譜在晚清民初的召喚及跨域接受」專題,共刊載5篇論文。有關「俠」的話語,從晚清以降各種創作或論述當中,就鋪衍瀰漫出不同的瑰麗想像與創造。尤其革命、崇俠與唯情的概念常結盟掛搭,中國傳統俠的豪情與公義形象,常被拿來與近代西方民族國家革命運動興起之豪傑英雄相互對應。在相關創作與論述文本中,一方面展現俠之於倫理世界的濟弱扶傾、捨身救難精神;另一方面,俠的為民為國、犧牲奉獻之舉,也往往揭櫫了民族主義召喚或動員革命背後最需要的浪漫情感。專輯中歐陽開斌、林以衡、黃繼立等三篇文章,無論是自我加冕為「主義之主義」的大俠魂;抑或以彰顯忠孝倫理為精神價值之劍客;甚至是流露「原始生命」直爽、野性、血性、缺憾和蒼涼的水滸群英,這些圍繞俠情所抉發的自我感悟與倫理關懷,以及透過跨域知識流動所賦予俠在情／義等概念上的重塑,都讓「俠」的話語更顯其張力與活脈。

首先,北京清華大學水木學者歐陽開斌所撰〈俱分進化:真情、革命與大俠魂〉一文,以安若定大俠魂論述為研究主題,爬梳其人其事及學說,並將之置放於五四以後「主義時代」的脈絡審視,由此進一步探討「革命」、「崇俠」、「情」等概念在民初時期如何俱分進化。大俠魂之真「情」,接續清末革命的兒女英雄,同時融入五四新

潮的「精神戀愛」，汲取五四跨歐亞反啟蒙思潮的能量，彰顯混雜之「情」貌。民初安若定如何從主義、哲學來重鑄國魂？以及如何鎔鑄柏格森的創化論、朱謙之的真情論，作為大俠魂的召喚及論述開展？在本文中都有精闢的剖析。本文深入闡析罕為研究者關注的文人安若定及其大俠魂論述中種種事件、觀念和實踐彼此的意義關連，對現代中國豐富、複雜的思想與歷史圖景帶來更整全的認識。

其次，與民初中國遙相對望，正為日本殖民統治的臺灣，其百姓日用人倫仍常牽繫於中國傳統儒家價值。佛光大學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副教授林以衡發表的〈人倫之情、尊卑之序：由漢文劍客小說中君臣、父子論日治臺灣忠孝觀的建立〉一文，即以1911年前後，日治臺灣時期《漢文臺灣日日新報》之多篇漢文劍客小說（翻譯作品）為對象，剖析其中人物、情節之中所涉及「忠、孝」議題；另一方面則將此小說主題放在日治時期臺灣，討論殖民統治者如何藉由小說反映「忠優於孝」的內容，進一步提升至以「忠孝一本」作為殖民地臺灣主要的忠孝觀。帶有濃厚大和風格的劍客小說在臺翻譯刊載於報刊，不僅反映東亞文學流動及對話開展；同時透過劍客小說中對劍客或是其他角色在「忠孝」上為人處世的描述，或是以「忠孝」作為人物品評高下的標準，皆使得殖民政府意欲將日本國體精神，深植於臺灣民眾之策略愈形彰顯。透過報刊小說及論說等互文參照，讓此篇論文在劍客小說所涉及君臣、父子倫常關係，以及傳統忠孝觀在近現代東亞（日治臺灣）觀念轉化的討論方面得以深化。本文透過不同類型之文本以及豐富史料之相互比對，讓劍客小說所涉及君臣、父子倫常關係，以及傳統忠孝觀在近現代東亞（日治臺灣）觀念的轉化，得以有豐富而深入的論述開展。

再者，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黃繼立〈「悟」於「無曲」：牟宗三與「水滸境界」〉一文，以1947年牟宗三撰述〈水滸世界〉為探討對象，除詮釋該文內容外，亦建構牟宗三個人學思轉換的心路歷程。「水滸境界」應可視為是牟宗三20至34歲（1928-1942）間，所

經歷過的心靈狀態。就牟宗三而言，讀《水滸傳》不僅是種追憶，且可以是「悟道」之契機。牟氏不僅追憶那個未歸宗於儒家前的「原始生命」之「我」，且進一步藉此「悟」於「無曲」之昔非。牟宗三推尊「純直無曲」的水滸人物，而這些人物「純直無曲」的表現，正基於原始生命對情識的率真。然原始素樸之心與人文的禮義世界固然有其相通，但卻也涇渭分明，從牟宗三的整體學思進程來看，其是如何從早年水滸之「悟」，逐步轉向而後契入歸於儒家，在文中亦有深入的闡述剖析。本文作者慧眼獨具，從學術的眼光直扣牟宗三之生命隱曲，深刻闡明牟宗三難以穿透的話語內在的深意，論述相當精彩深入。

「義非俠不立，俠非義不成。」<sup>4</sup>「俠」非常人，故往往在大時代中擔負振衰起弊之效。晚清以降，從個人身心安頓之「小我」到家國社會革命奉獻之「大我」，讓我們看到在失序的歷史世界中，是如何搭建出另外屬於情與義所交織而成的「有情的共同體」。這一倫理世界不再是「愛有等差」，而是跨越血緣身分邊際而重新定義什麼才是「完全的人」。顧頡剛（1893-1980）在1928年的一場演講中曾指出：「道是什麼？就是主義。主義是跟著時勢變的。各時代有各時代的時勢，所以各時代有各時代的道。」<sup>5</sup>主義作為一種思想、信仰及力量，其背後的情感向度，亦是值得加以考察。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助理教授何維剛〈試論姚琮《味筍齋詩鈔》的詩學關懷與離散書寫〉一文，以戰後來臺的著名詩家姚琮之《味筍齋詩鈔》為研究對象。《味筍齋詩鈔》在臺灣三度付梓，三種詩集多處刪改與重寫，於詩作汰選與內容加筆、減筆之間，呈現出姚琮晚年心境及審美傾向。姚琮作為國民黨高級將領，自廿三歲學習古典詩創作，歷經中日戰

<sup>4</sup> 李德裕著，傅璇琮、周建國校箋：《李德裕文集校箋》，《李德裕文集外集》，卷2〈豪俠論〉（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頁660-661。

<sup>5</sup> 顧頡剛講，鍾敬文記：〈聖賢文化與民眾文化〉，《民俗》第5期（1928年4月），頁2。

爭、國共內戰。六十歲渡臺後，其特殊的生命經驗與詩歌創作，既有個人情志的抒懷，也有主義信仰所形塑投射而成的生命力量。論文以「詩學關懷」與「離散書寫」為兩大關注要點，除了窮搜所得姚琮之詩學文獻詳加考訂外，文中並深入剖析姚琮詩歌創作與批評兩方面之內涵，尤能凸顯夾雜於黨國大我與詩人小我之間，面臨世界變動、身分轉換與老年迫近的姚琮之個人情志與詩學倫理，補充了戰後初期自中國大陸離散之詩人相關研究缺塊，且國軍軍官中能文者所在多有，然至今研究雖已及於白話文學，而於舊體詩文之措意依然不足。本文之撰寫，正好填補了這片空白，於研究領域的開拓亦有所貢獻。

人生觀既可透過詩文寄情抒懷，亦可經由理性辯證看待人之實存經驗與意義之關聯，尤其情感啟蒙，不僅牽涉到心理學或神經科學上的情感，也牽涉到我與非我、主體與客體的相互關係，與西方的情動力是有所相通。<sup>6</sup>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周志煌〈作為反機械主義的「格式塔」(Gestalt)概念在中國民初知識界的接受及闡釋〉一文，考察在民初科玄論戰之後，作為機械主義對立面的「格式塔」(或「完形」)概念，如何以其所強調整體、生機、機體、機能、力動、直覺、創化等特色，在中西涵化過程當中，融入中國整體和諧、生生之德的人生觀與文藝精神。格式塔(Gestalt)概念約莫在1926年進入到中國學術界的視域，“Gestalt”所屬德國心理學派產生於1912年左右，透過報刊的譯介，相關學說在中國的接受可說是與歐美學術界同步進行。包括高覺敷、蕭孝嶸、朱光潛、宗白華及方東美等學者對於「格式塔」或「完形」闡釋，都強調經驗與意義是彼此相依，不可或離；並藉此闡述人如何透過對於生活經驗動態歷程以及整體的直覺把握，從而達到參悟大化生機而與之渾然合一的生命境地之追求。本文聚焦「格式塔心理學」在中國民初時期的發展，是學界少見的論述，在民國初期跨文化流動帶來的複雜的文化交涉與跨語際實踐，以

<sup>6</sup> 關於此可參看彭小妍：〈導言：唯情與理性的辯證——五四的認識論〉，《唯情與理性的辯證：五四的反啟蒙》（臺北：聯經，2019年），頁17-50。

新題材、新的問題意識、新的觀點作跨域研究，往往能一新耳目，也能提搨出新意。

以上五篇專題論文，就知識的跨域而言，包含文學、藝術、倫理學、歷史哲學、文化哲學、心理學……等傳統與現代知識的對話，共織「情」之系譜網絡。此外，在地域的跨界來看，透過近現代中國、臺灣，以及東亞日本，歐美等跨域的概念與知識流動，無論是個人生命的啟蒙之旅；或是歐美、東亞相關知識譯介進入中國，抑或日本帶入臺灣殖民話語所強化的情感共同體（忠孝一本）；甚至1949年後渡海來臺感時憂國、情迷家園中的詩家關懷。經由相關學術文獻以及創作、論述之整理爬梳，此次專題在不同案例中勾勒出「情」的各種現代思維特徵，以及「情動」過程當中，從個體到家國、私密到公共論域，所顯示的情志生命及倫理關懷，讓關乎「情」之概念的各種主旋律與低音得以產生共奏和鳴之效。